

數字復活——記憶哲學的審視

Digital Resurrection: Assess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Memory

楊慶峰

Yang Qingfeng

摘要 Abstract

數位復活是利用數位技術、大資料和人工智慧等技術實現的同一性的再現式行為，數位人是一種特殊的數位記憶形式。從語言維度看，語言再現能夠將逝者的聲音和言語方式再現，

楊慶峰，復旦大學科技倫理與人類未來研究院教授，中國上海，郵編：200433。
Yang Qingfeng,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thics for Human Fu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433.

基金專案：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案“當代新興增強技術前沿的人文主義哲學研究”(20&ZD045)成果。

《中外醫學哲學》XXII:1 (2024年)：頁 65-8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2:1 (2024), pp. 65-89.

© Copyright 2024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但是數位語言存在如無法呈現世界經驗，數位主體的語言與理解呈現出分裂、無法再生意義以及非言語行為的單向交流等問題；從影像維度看，圖像再現能夠將逝者的影像呈現，數位圖像數能夠確保整體性的構建，但是卻無法實現道德責任的建構。面對數位影像，我們無法實現對數位親者和數位他者的道德責任。從復活主體看，復活自我、復活他者和復活親者是數位復活基本的三種形式。復活自我的本質是增強意義上的做法，而復活他者則是懷念意義上的做法；復活親者是悼念意義上的做法。

Digital resurrection refers to a representational act involving digital technology, big data, 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which the digital agent offers a specific form of digital memory. From the linguistic dimension, although language reproduction can imitate the voice and speech styles of the departed, digital reproduction cannot present a lived experience of them. The digital subject, which exhibits a split between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may fail to regenerate a clear meaning or unidirection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animated image of the departed. In terms of the digital agent, ambivalent relationships exist among the three entities of the departed, the self, and the other. Digital resurrection can offer three forms of meaning: an enhanced meaning from the self, the memorial meaning of the other, and a condoling meaning from the departed. Who is the resurrected agent? Who has the digital memory? Who is ethic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digital data used to create the digital memory? All of these questions should be addressed and discussed.

【關鍵字】 數位復活 數位人 記憶哲學

Keywords: Digital resurrection, digital agent, philosophy of memory

許多中國詩詞是關於古人懷念死者的作品，其情感表達很是強烈，從“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沈園二首》）到“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對古人來說，逝者已去，無處尋覓音容笑貌，無處寄傷心，

只能借助懷念、祭祀等儀式再次將逝者呈現。於是也就有了“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的說法。隨著數位技術、元宇宙、大模型等發展，今天的人可以隨時將死者進行數位復活(Digital Resurrection)，從而釋放思念之情。現實中，利用數位技術、冷凍技術進行死者復活的技術產業日漸成熟，利用語言大模型可以說做到死者聲音再現，甚至可以做到死者所留的文字生成圖像；也許未來我們進入元宇宙和逝者相會。總而言之，在數位時代，今人對逝者的情感不需要寄託於某物，“睹物思人”變成了與死者的再次親近，這些都是以數字復活的形式表現出來。我們預備採取記憶哲學的方法進行反思數字復活。在這一方法下我們關心的問題是：數字復活行為是否還有記憶行為的特性？記憶主體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一方法能夠讓我們對復活的思考從行為轉移到主體之上，更準確地說，轉移到生者的記憶行為及歸屬。在保羅·利科的記憶倫理思考中，記憶歸因分析是一個主要的手段，他把記憶歸因到自我、他者和親者之主體。據此，數位復活的物件也可以區分為自我、他者和親者。此外，在數位復活中被呈現的聲音、圖像等與相關記憶密切相關。

一、數位復活的類型及其行為本質

從字面上看，復活與死亡關係密切。如果說死亡是生命構成精神和身體的終止，那麼復活就是重新讓死者獲得精神與身體活力，確保二者的連續同一性。在埃及神話中，蛙頭女神哈克特(Hekt)與金龜子甲蟲都是復活的符號。(Mackenzie 1913, 16)無限次復活也就是通常說的永生。從這個角度說，確保個人同一、身體同一是與復活相關的關鍵哲學問題。哲學史上，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辯護了復活的可能性，他明確指出，復活是同一意識的回歸。(Thompson 2022, 141–80)在這種解釋中同一是符合洛克一貫的思維，即同一靈魂的回歸。洛克的回歸應該強調了原有的意識再次

出現在不同的身體之中，因為隨著人的死亡，意識與肉身都會消亡。只能通過特定方式將不死的靈魂找回。而艾露西·特因 (Alexey Turchin) 認為復活是基於資訊的人格重構。(Turchin 2018) 這個定義包含兩個重要的地方：一是資訊是復活的基礎，這一點對於理解數位復活有很重要的幫助。在數位復活的語境中，資料是基礎，缺乏資料無從談到對逝者的重構；二是人格重構，復活並不是單純的人格重構，而是同一人格的再現。特因的重構也強調人格再次構建的特徵，然而再次被構建的人格與原有的人格有著相似性，否則復活就談不上。所以，靈魂或者人格同一性保持就成為復活的關鍵點。

從技術角度看，用於復活的技術可以區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冷凍術 (cryonics)，這種技術用冷凍的方式將死者保存，然後經過若干年後重新復活。目前國外已經出現了一些公司承接此項業務，將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冷凍起來，等待技術成熟再重新加以復活；第二類與意識上傳 (mind uploading) 有關，目前這種技術並沒有實現，只是停留在科幻領域中的一種嘗試。第三類是情景化構念表徵方法 (CCR, Contextualized Construct Representation)，測量歷史文本中人物的心理建構，即根據歷史資料中的人物心理資料進行複現，然後把歷史人物的心理狀態加以複現的做法。(Chen 2024) 這三種技術我們可以稱之為科學化復活技術、科幻化復活技術和詩意化復活技術。冷凍技術與科學化復活相關，現實存在著的科學技術。而現階段隨著 AI 技術的成熟運用，數位技術、人工智慧技術成為數位復活的主要方式。克裡斯汀·克魯威 (Christina Klüver) 等人尤其關注 AI 復活的問題 (Willmann 2022)；科幻化復活與意識上傳相關，現實不存在，目的是實現永生。這種多見於科幻作品中；詩意化復活是一種比喻意義上的，比如上述歷史研究中的做法。

因為第三類技術是比喻意義上的使用，與我們目前討論的問題關係不大。所以我們根據上述兩種技術的劃分把數位復活劃分

為兩類：逝者復活和生者永生。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區分復活與永生的根據是主體是逝者還是生者。此外，還可以通過身體與靈魂的關係進行劃分。對於復活來說，身體保持同一，靈魂再次回到身體的過程。而對於永生來說，身體不必同一，靈魂貫穿在不同的身體之中。當然，如果從死亡角度進行判斷，也可以說復活是在遵循死亡的原則，對死亡狀態的改變；而永生則是擺脫死亡的限制，也就是擺脫時間性存在。

1. 基於冷凍技術、AI、大資料等技術的逝者復活

復活逝者的個體動機在於生者對逝者的情感。蘇軾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這首詞表達了作者對於死去妻子的無比思念之情，詞中有“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的描寫。閱讀者也能感同身受作者失去愛妻的痛苦。在逝者的復活中，復活的物件是已死者，生者出於情感需要，對死者的生前數位資訊進行軟體處理而生成數位人。這樣的數字人沒有世界，只是一個單純的數位影像。吉伯特·西蒙棟 (Gilbert Simondon) 在《技術物的存在方式》指出了認識技術物的第一個階段是將原始的技术物看作是沒有背景的。“第一階段試圖掌握技術物的發生論：技術物不應只被視為人工物，它的進化是一個具體化的過程。原始的技術物是功能分散和孤立的抽象系統，沒有存在的共同背景，沒有相互因果關係，沒有內部共鳴。”(吉爾貝·西蒙棟 2024, 234)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被復活的數位人表現為孤立的、原始階段的技術物。因為它剛剛被製造出來，所以沒有與親者的共同生活經歷，親者對於它們感到陌生；因為它缺乏與世界的因果關係，對於人而言，任何事情都有著因緣關聯，因果相報。但是數字人的“因”很難確立起來，儘管它會產生實際的結果。生者可能因為重新見到了作為親人的孿生對象，會產生情感慰藉。但是數字人並不會對生者的情感產生共鳴。原始階段的數字人中，存在著生者-死者的二元關聯，原先的親者關係在發生著很大的變化。在這種含義中，數位復活是數位替代，此外，死者無法真實再現，

復活的數字人無法實現進化，可以做的是在模擬性上無限逼近曾經的生者。

由於人類歷史上靈魂不死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復活只是指身體復活，靈魂只是換來了一個居所。但是復活身體普遍動機卻是超越上述樸素情感的，吉·湯姆森 (Jon W. Thompson) 分析了 17 世紀支持復活的原因至少有三個：其一，身體與靈魂在構成人上同樣重要。如果個人在死後實現完全同一的復活，面對自己的獎勵和懲罰，身體必須復活。簡而言之，在一個人死後靈魂持存。其二，人類靈魂儘管是非物質的，為身體自然地提供支援。其三，支持身體復活的理由是身體不僅僅是非物質的靈魂，為人的過失或者值得稱讚的人類行為承擔責任。(Thompson 2022, 35–6)

2. 基於人工智慧、意識上傳的生者復活

在生者復活中，復活的物件是未死的自我。自我出於增強目的，更準確地說，想獲得永生，將自己的心靈意識資料上傳到元宇宙中，這樣的 agent 在一個虛擬世界中存在，AI 是主要角色。(Turchin 2018) 在這種含義中生者已經成為不死者，無限延續生命。它以智慧體的方式實現進化，從而可以導致一個他者的出現。所以在這個含義中，並不是生者–死者的二元關聯，真正的關聯是自我–已死的自我–重生的自我。這是一個三元結構，其本質是自我貫穿在整個過程。但是正如我們上面所分析的，這種敘事是科幻化敘事，充滿了太多的想像空間。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德國學者克裡斯汀·克魯威 (Christina Klüver) 在對永生的意義追問中指出，從進化的角度看，永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個社會中個體的學習能力、發展能力、吸收能力和創新能力將耗盡。(Willmann 2022, 134) 他的論證讓我們強化了這樣一個觀點：當前的數位永生研究源出於科幻文學，是文學想像的一種結果。當然，隨著人類話語的增強，數字永生研究有望逐步擺脫這種窘境，成為人類增強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

隨著 AI 技術的成熟，再現聲音已經完全可能，OpenAI 的 Voice Engine 可以做到 15 秒複製人類原聲，利用 15 秒的音訊樣本和文本輸入，便能生成與原始說話者聲音高度相似的自然語音；還有微軟 Vall-E2 可以完美模仿人類聲音；國內 Bailing-TTS 模型可以生成高品質的普通話語音，還能生成河南話、上海話和粵語等多種方言語音。(Di 2024) Lumina-mGPT 可以完成從文本描述生成逼真圖像這個任務。我們接下來從記憶哲學的角度考察“再現式理解”的可能性。“當我們希望從記憶中回想起與某一主題相關的特定的事情，使用的方法是腦海中浮現許多相關的事實、圖像，希望它們足夠多、足夠生動、足夠獨立、足夠特殊，從而啟動合適的記憶。”(Good 1966, 45)無論何種數位復活，國內學者對數位復活行為的本質多理解為對人物的語音、語言和影像的數位再現，生者感知到逝者的影像、智慧生成且相似的語言和表達方式。目前數字復活卻沒有對主體言語行為再現加以討論，數字人言語行為的習慣和方式能否像逝者那樣？可以讓數字人以我們熟悉的逝者姿態呈現行為，把這種理解方式稱之為“強調逼真性的再現式理解”。但是與中國實用主義理解不同，國外學者的理解強調復活中的身體與精神的同一性即“同一性理解”。我們將從記憶內容與記憶主體展開討論。在記憶內容的討論中，語言和影像是重要的仲介。在大多數數位復活中，逝者的語言、影像是最重要的兩個方面。我們在後面的分析中把語言劃分為聲音和詞語兩種成分；對影像的分析和情感聯繫在一起；而在記憶主體的討論中，將借助記憶歸因這一重要的概念展開分析。

二、數字再現：語言的維度

當我們回憶逝去的親人時，閱讀關於他們的文字、看他們以往的照片，腦海中都會出逝者的音容笑貌。但是借助數位技術，人們不再是這種形象浮現在腦海，而是展現在特定的螢幕上。在數位復活中，數位人是數位再現的產物，“逝者的聲音、語言和

影像得到了再現”。這個存在物以及生成過程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智慧生成。這種生成沒有特殊性，而是從主體的資料中學習生成一個聲音。這個聲音沒有主體，缺乏內在意義。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我們可以用來分析再現語言這一維度。我們對語言總體的分析基於解釋學的理论做出，在這一理論之下，有五個特徵需要注意到：

(1) 語言與理解的關係。人類理解和語言無法分開，而在理解中發生的事情是談話者彼此的“視域融合”，而這乃是語言真正的成就。一個人與他的談話夥伴關於某個事物取得相互理解，而這一點是通過語言的形式產生。談話夥伴會結合成一個新的共同體。“談話中的相互理解不是單純的自我表現和自己觀點的貫徹執行，而是一種使我們進入那種使我們自身也有所改變的公共性中的轉換。”(伽達默爾 2004, 491) 可以說，借助語言進行談話，對話者之間形成共同體，而遵循著彼此認可的社會的、道德的、規範的東西。在語言與理解之中，有三點需要注意到：其一，通過經驗而獲得的知識以及他人的理解是道德現象；其二，理解的關係是反思性質的你-我關係；其三，具有開放性特徵的效果歷史意識在同一個共同體中實現。(伽達默爾 2004, 465-70)

(2) 語言與經驗的關係，人類的語言表達特定的經驗。“然而，在語言發展過程中，在學習名稱的過程中，每一種活的經驗都被符號化，並且歸屬於每一個印象，同時彼此之間建立新的聯繫和紐帶。”(Cassirer 2021, 342) 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中對語言做出了語言是解釋學本體論的視域，而在這一規定下具體表現為三種規定，其一是語言作為世界體驗；其二是語言作為仲介和推斷性結構；其三是解釋學的普遍特性。而語言作為世界經驗是第一重規定。在伽達默爾看來，“哲學的任務是必須處理的乃是我們的世界經驗和生活經驗的整體。整體性並不是物件，而是包圍著我們並且使我們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境域。”(伽達默爾 2004, 817) 那麼如何完成這一任務？在伽達默爾看來，語言成為

一種有效的線索。“我們的整個世界經驗以及特別是詮釋學經驗都是從語言這個中心出發的展開的。”他在《真理與方法》中提到了這一點：在談及“世界經驗的語言束縛性”概念時他指出，我們進入陌生的語言世界而克服了我們迄今為止的世界經驗，但這不意味著我們離開了自己的世界並且否認了自己的世界，“我們就像旅行者一樣帶著新的經驗重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鄉。即使作為一個永不回家的漫遊者，我們也不可能完全忘卻自己的世界。”(伽達默爾 2004, 581)

(3) 語言與歷史性的關係。如果說語言表達了特定的經驗，那麼真正的經驗是什麼呢？伽達默爾指出，人類真正的經驗是對有限性的經驗和歷史性的經驗。“真正的經驗就是這樣一種使人類認識到自身有限性的經驗。”(伽達默爾 2004, 464) “真正的經驗就是對我們自身歷史性的經驗”。因此可以說，人的有限性是“歷史性的有限性”或者“時間性的有限性”。我們對他者與親者的體驗恰恰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上：親者如我們一樣是有限的，有死的。對於數字人來說，也存在一種有限性，我們稱之為“物質性的有限性”，但是這種有限性確是建立在物質有限性的基礎上，主體的相關資料是有限的、生活的環境是有限的虛擬世界等。

(4) 交流是一種再生。根據古德，在交流中總是存在一個泛化再生 (regeneration) 過程，這是一種再重構過程，同時起到經濟功能。比如語言中詞語的使用就是一個泛化的、層級的再生過程。“再生過程出現在每一個韻母、詞語、句子以及更長的綿延上，甚至在語義層次上，然而它起到了經濟功能。”(Good 1966, 38)

(5) 交流包含言語行為。“我認為在任何語言交流的模式中都必须包含有一個語言行為。構成語言交流的基本單位是在完成言語行為中給出標記。更確切地說，在一定條件下給出語句標記就是非表現行為，非表現行為就是語言交流的最小單位。”(約翰·塞爾 2016, 89) 在這個過程中規則、命題和意義是三個初始概念。

對於活的人來說，發出聲音或做出標記就等於完成了言語行為，也就是說活的人通過這些聲音或標記意謂某種東西。而意謂某種東西即“通過讓別人去領會我們要產生的某種效果的意向來試圖產生某種效應。但是我用來產生這種效果的手段，憑藉支配使用這種手段的規則，通過慣例才能被用來作為一種產生不同的非表現效果的方法。”(約翰·塞爾 2016, 99)所以在交流的過程中，說話者能夠讓聽者領會意圖，並且使用某些話語的規則和它產生的效果必然聯繫在一起的。

接下來我們把語言的構成因素劃分為語詞和聲音，語詞是指語言的文字書寫形式。凱西爾堅持了這對劃分，他對詞語和聲音的意義給予充分闡述。“詞語是觀念的符號。符號或者被看作是客觀的和必然的認知內容或者主觀的表徵。”(Cassirer 2021, 85)可以看出，語詞本身與語義相關，牽涉到主觀表徵或者客觀的認知內容。而語音則是聲音體現，和語言主體密切相關，準確地說，與語言主體的語境與個體情感有很大關係。“從其特徵上看，人通過這些聲音或標記意謂某種東西。”(約翰·塞爾 2016, 97)“意謂某種東西”則是“我企圖在聽者身上產生預想效果的話語，而這種效果是通過讓聽者領會我要產生那種效果的意向實現的。”(約翰·塞爾 2016, 97)塞爾的分析帶有一定的功能主義，說話者在聽者身上產生預想的效果，而這個效果來自必然結果。但是，當我們從聲音入手的時候，其除了意義效果之外，還有情感效果，這在一般的語言分析中並沒有太多被關注。“因此，在物件呈現的最高決定因素的核心，聲音保留了它內在的意義。”(Cassirer 2021, 92)而在凱西爾的語言哲學分析中注意到了情感效果這個因素。但是他把他看作是圖像所致的結果。“對於詩歌語言來說，它不再是概念的抽象表達，而是在其中每一個詞都有自己的聲音和情感價值。”(Cassirer 2021, 91)

建立在上述語言維度的分析之上，我們可以來看語言的數位再現之缺陷了。這種缺陷至少表現為三點：

(1) 機器語言無法呈現真正的經驗。對於數位復活物件來說，語言是必不可少的維度。在人工智慧語音處理上，機器採用類比的方式模仿出當事人的聲音，而輔助於大語言模型。二者結合使得數位人復活實現了語音上的接近。換句話說，外人聽到一段語音，與真人話語無異。但是問題就在這裡產生了“像真人的話語”其意義何在呢？我們從解釋學的理论中可以看到，語言表達經驗，而真正的經驗是歷史性經驗或者時間性經驗。但是對於機器語言而言，並沒有這個特徵，它是根據變化模型預測而來的語言性表達，而與經驗無關，更談不上真正的經驗。

(2) 復活主體的語言與理解呈現出複雜的情況。如伽達默爾所說，對於人類而言，語言與理解不可分離。而在當前關於大模型的理解能力探討中均割裂了語言與理解的關聯。在這裡存在一個特殊情況，對於大模型來說，語言交流能力不再成為問題，換句話說大模型具有語言能力，但是大模型的理解能力卻是存在很大爭議。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說是兩種能力的分離，真實的情況是，大模型語言既沒有人類的語言與理解的不可分離特性，也沒有技術語言中的分離特徵。分離的前提是二者作為實體存在。但是在在大模型中，是一種奇特的關聯：有語言卻無理解。對於數位復活來說，這項技術必然有大模型嵌入其中。艾略特·瑟恩雷 (Elliott Thornley) 指出，未來數字智慧體 (digital agent) 很可能是建立在大模型基礎上，今天的大模型有時候表達出避免關閉的意願，因此推理可得關閉將阻止他們完成目標。(Thornley 2024) 因此對於數位復活的語言維度來說，就呈現出“有語言無理解”的特徵。

(3) 交流行為是單向的，而並非言語行為以及再生某物。“如果聽到屬於簇的任何聲音（聽覺時間序列），那麼聽者精神上再生了這個聲音以及用這個詞的某些表徵替代了聲音。他傾向於記住、或者寫下這個詞及其不準確的聲音，儘管如果注意聲音的任何特徵，它可能也會被記住。記住一個詞而不是準確地聲音的好處是記住較少的東西以及處理較少量的資訊。” (Good 1966, 38)

機器與人類之間的看似互動的過程無法形成共同體，也無法形成某種特定的、規範的、道德的東西，換句話說，無法形成理解。這也是我們在分析大模型無法理解的不可忽視的地方。大模型之所以不理解，是因為其無觸及真正經驗的語言。

無論是 Voice Engine、Vall-E2 還是 Bailing-TTS 大模型，儘管它們能夠生成近乎真的語音，展現出強大特定的語音生成功能，大模型使用語言和人類使用語言的方式有著極大不同。有篇文章從“人類和低語言能力者的語言發展和使用過程”的差異出發，文章指出，人類的認知汲取了多種意義來源，包括經驗、情感和想像力等方面，它們超越了單純的語言處理，植根於我們的社會和發展軌跡，並且感知、行動和認知之間的相互作用塑造了人類的理解和表達。而大模型語言發展和使用語言“缺乏身體體現，降低了他們理解感知、行動和認知之間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的能力。”(Riva 2024) 可以說，這一分析抓住了一些根本。從我們上文的分析看出，數字復活能夠做到特殊個體的語音再現，但是卻永遠失去了“主體”，失去了經驗特性，無法做到理解，其背後的經驗不再是“歷史性的有限性”，而完全轉變為“物質性的有限性”，也無從做到交流，因為在人類借助語言的交流行為是雙向的、建立在歷史性的有限性基礎上。但是對於大模型來說，很顯然無法確保這一點。

三、數字再現：影像的維度

數位復活中被再現的物件除了語音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影像。相應的演算法會對逝者的各種靜態照片和動態影像資料進行學習，從而再現逝者的不在場的音容笑貌。因此對影像再現需要進行分析。首先面對的問題是，對外感知物件與外感知物件之圖像進行比較分析。

胡塞爾對外感知物件給出了如下描述。“如果我們看桌子時，那麼我是從某一個面來看它，這個面再次是本真的被看之物；

它還有其他的面。它有一個看不見的背面，它有看不見的裡面，而桌子這一稱號實際上是諸多面的稱號，亦即諸多可能的可見性全體的稱號。這是一個十分奇特的本質狀況。”（胡塞爾 2017，15）這個例子旨在說明外感知是一個連續過程，“正是在這些連續過程中，同一個物件將會不斷地嶄露新的面。……”（胡塞爾 2017，17）可見，現實物件是立體呈現的過程。在日常生活中，親者對於我來說，首先是外感知物件。但是這種外感知物件的獨特之處在於與其相伴、相生活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個整體性。比如親人之間的整體性會隨著歲月流逝而逐漸鞏固，即便是內部發生爭吵、衝突，這種整體也穩固地保持自己的結構。此外，世俗、法律、倫理等多種力量將這種整體性強化。而在一般的外感知物件與我的關係中，無法形成這樣一個整體。我日常使用的一支筆，用完之後這種關係就消失了，或者我丟棄它，這種關係也嘎然而止。

在親近關係的感知中，臉部成為一個重要的媒介。“我們首先看臉，正是通過臉部的表情，才會有親近感。”（Clark 1956，205）然而還有一種情況，在親近關係中，一張可憎的臉越發可憎，而擺脫這種關係的願望越加強烈。被列維納斯稱為他人的臉是“不可歸約的超越的蹤跡，它不是理智上的抽象，而是一個從寄身於脆弱的有限人生的東西中萌生出來的東西的變式，他人性（otherness）總是我們碰不到的，是超越所面對的那個人的綜合能力的。”（理查德·科恩 2014，43）他人臉的意義是“他人的臉、他人之變化或人性是賦有道德責任的，由此而刺激著他所面對著的我，不是那個（外表所見的）主體，而是我自己，使之成為對他人和為他人而具有道德責任的第一人稱的自我。”（理查德·科恩 2014，45）

除了臉被討論之外，還有背影的討論。朱自清的《背影》留給每個讀者深刻的印象：

“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作者看到父親爬過鐵路月台、去買橘子的蹣跚背影，通過這段描寫，深深的父子情被呈現出來。

物件正是在綜合連續過程中被呈現為可見的全體。從這個角度看，物件呈現的側顯、演化之差異會帶來不同的意義。而這些意義恰恰表現為不同記憶的形成。如父親的背影、左側臉龐、正面的臉孔給人留下深刻記憶。所以我們的分析表明：外感知物件的描述忽略了親者與我的整體性形成，僅僅為我們討論親者提供了第一步；而作為他人之臉則賦予了某個主體的道德責任。

這一思考也深深的影響了數字復活的思考。大多數人會以為，數字人是一個封閉環境中的單純影像，不會與現實世界進行互動。準確地說，無法與生者互動。這一假設在人工智慧發展的今天已經被逐漸打破。正在發生的情況“機器人正在逐漸學會應對真實的環境。視覺模型不僅可以通過照片進行訓練，還可以在全三維世界中進行沉浸式即時訓練。”(李飛飛 2024, 412) “能夠與生者互動的”數字人實際上是一個智慧體。然而，我們深入思考就會發現，借助數位技術的影像再現即便能夠確保整體性的構建，卻無從實現道德責任的建構。面對數位影像，我們只能在得到情感滿足的基礎上，但會存有深深的遺憾：無法實現道德責任，無法進一步實現親者的責任、後代的責任而悔恨。

四、數字再現：主體的維度

以上分析主要是從記住什麼的角度進行了闡述，我們可以將這種分析看作是記憶內容的分析。通過再現語音、語言、圖像，一個准主體的構成成為可能。記憶現象學要求要從記憶內容向記憶主體的轉變，也就是說，從記住什麼轉變到誰在記憶這樣的問題。這種路徑無疑能夠為數位復活的分析提供新的維度，讓我們看到數字記憶屬於何者這樣的問題。

为了更好地分析數位人涉及到的數位記憶問題，我們將借用利科的記憶歸屬理論進行分析。《記憶、歷史、遺忘》提出了記憶的歸屬分析，他的記憶歸因分析具有鮮明的主體特徵，在他看來，記憶有三重歸因假說：歸因於自身、親者和他者。當他這麼做的時候，其實質是將歸因分析抵達具有歷史性的主體、經驗主體。而後文分析數字記憶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需要通過詮釋建立一個理論基礎。在這個分析中有兩個方面需要加以關注：第一個方面是為何為歸屬的問題；第二個是歸屬於何者的問題。

歸屬的來自心理學領域，一般的心理學和現象學總是對心理活動進行本質分析或者結構描述。對於一般心理學來說，對心理分析總是從因果關係給予闡述，尋找某種心理狀態的因果解釋，對於神經心理學來說，對某種心理學的神經機制給予實證研究。在哲學中，不再重視這種因果分析，而是更加注重心理行為的本質分析。胡塞爾的現象學就是一個典型的形式，對認知、想像和回憶等意識體驗給予第一人稱的分析，當然他的分析突出了意識行為的構成分析，即把意識行為與意識物件給予區分，通過意向性將意識行為的本質給予了哲學闡述。然而，從這種現象學出發，我們只能獲得心理行為本身的分析，而將主體給予忽略。

當我們說歸屬是關涉心理活動的時候，並沒有對這個範疇做出根本性的規定。從上述關於心理活動歸屬某個主體的分析中，我們所獲得的普遍結構是意識歸屬於主體。但是當我們進一步發問，歸屬的本質時，這個問題並不是很清楚。在利科看來，歸屬包含著佔有 (ascribe)、歸罪、富有責任的三重意義。“此外，在

‘歸於’的表達之上，結合了歸罪的 (impute)、負有責任的 (accountable)(承擔自己的責任、有責任的或承擔一個他者的責任)的表達。”佔有從詞義上可以理解為“認為是……的特徵”。比如我可以把思維認為是自我的一個獨有特徵。在我思中，我進行思考、我在思考，思維是一種主體的能力，作為理性主體的自我先天地擁有這個能力。此時說思維歸屬於自我顯然是擁有的意義上來說的。歸罪可以解釋為歸咎於某人，把某個罪惡、壞事歸咎於或者歸罪為某個主體。比如一個人遲到了他可以把這個問題歸咎於自己的惡德或者客觀的因素。這個含義很顯然排除了善的因素，我們很顯然不會說把某個好事歸咎於某人或某個因素。負有責任的是一種倫理上的歸屬，比如父母對於孩子負有養育責任。我們可以把這種養育責任歸屬於父母。如果我們把內涵以圖示的方式表示，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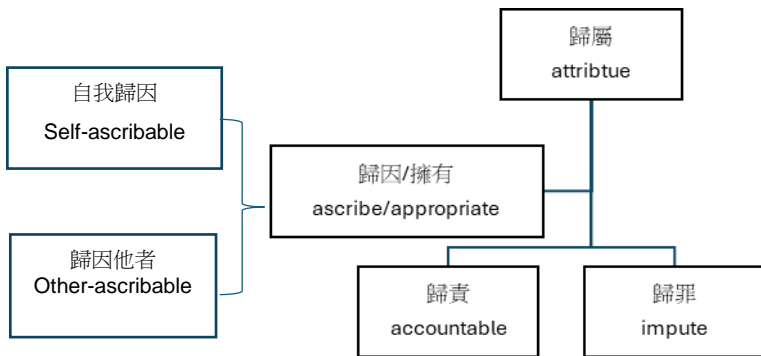


圖 1：記憶歸屬分析的概念關係

當我們把注意力轉移到心理行為所屬的主體時，歸屬於何者的問題就出現了，這意味著歸屬分析就變得可能了。何者的變遷與哲學史的轉變表現出平行關係。近代西方哲學構建了主體哲學傳統，這個傳統充盈著對先驗自我的反思和批判。笛卡兒建立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題，對於“我思”的解釋是我在思考，意味

著我進行著反思、懷疑。後來的哲學從不同的角度反思這個前提。比如胡塞爾的主體間性開啟了從他者反思自我的傳統；海德格爾提出的“此在”開啟了從歷史性角度反思自我的傳統。這兩個反思角度有著明晰的哲學家作為根據。但是還有一條從經驗角度反思自我的傳統，這個傳統構建起了經驗自我來反思先驗自我。所以當我們在這個轉變話語中看到歸屬問題時，心理行為的歸因分析經歷了“屬我性”到“屬他性”的轉變。

歸屬分析可以劃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歸因分析的潛在階段。在胡塞爾現象學中，強調第一人稱的意識行為分析，也就是說突出了意識行為的屬我性。與意識行為相關的自我呈現為先驗主體這樣的一個大總體，而此時主體是缺乏歷史性和經驗性的。歸因分析即便進行也只是抽象意義上的分析，即把心理行為歸結為抽象的自我主體。但這只是奠定了一個抽象基礎。第二段是歸因分析的顯性階段。當代哲學家在反思先驗自我的路上大踏前進時，歸因分析變得更为可能。在這一階段，歷史性主體和經驗主體成為反思先驗自我的必然結果。當分析的目光所及之處達到歷史性主體時，心理行為屬於有生有死的主體。主體有時間性，心理行為也表現為稍縱即逝的現象，所謂的念頭就會呈現出來。念頭的本質分析難以基於某種穩定態進行，它的暫態性決定了缺乏穩定的基礎。當分析的目光所及之處達到經驗主體時，動物主體、機器主體就成為可能。這就為數字人的分析奠定了一種理論前提。

當把這一結構運用到記憶及數位記憶現象時，也會面臨記憶歸屬於何者的問題。這需要我們更為細緻的闡述。對於一般記憶而言，記憶歸屬於自我就會出現“屬我性”特徵。這是記憶的獨特之處，記憶屬於我的，是我親歷的一種東西。記憶歸屬於他者就會出現“屬他性”特徵。“向他人歸因因此不是外加的，而是與向自身的歸因同外延的。兩者缺少任何一個，另一個都無法進行。”（保羅·利科 2018，161）

對於人類記憶而言，記憶可以歸因於自身，即主體擁有自身記憶，記憶的“屬我性”成為首個區別性特徵。這種屬我性是通過歸因、歸責來實現的。歸屬即佔有，自我經歷了某些事情，形成獨特的體驗，這些體驗以滯留的形式轉變為長期記憶。自我佔有過去的體驗。這種功能意義上的佔有是其明顯的特徵；歸責即通過倫理的形式實現佔有，但這不是事實性佔有，而是一種倫理性佔有。比如對於集體來說，有責任記住為集體生存做出貢獻的、並且失去生命的人。對於個人來說，也有責任記住來自他者的幫助，也是感恩心。在一個家庭中，孩子與父母變老，父母給予孩子照顧，這種情況下，孩子是有責任記住父母的，將父母變為歸責意義上的佔有。而對於一個家族來說，長輩起到極大的作用。因此也有責任記住他們。

但是在數字復活中，這種記憶的屬我性會受到極大的影響。數字人無法佔有這些記憶，更準確地說，某個他者的數位記憶構成了數位人的存在，正是這些歷史資料才使得數位復活得以可能。當然，這個問題的討論還會牽涉到數字人的自我意識。如果我們把 AI 復活納入其中，問題變得更加複雜。目前 GPT-4 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識，如果是這樣，意識的屬我性對於人工智慧體來說就變得可能了。但是對於當前的數位復活來說，數位記憶的歸屬問題變得完全異質：記憶的屬我性受到損害。對於第一種意義上的數字人來說，並不能算是智慧體，無法形成屬於它自身的記憶。

數位人能否成為他者？當 AI 智慧體出現時，會呈現為獨立存在的他者。但其意義僅在於與我有差異的他者。數位人並不是我，它是異我的存在者。而真正的“他者”必然會牽涉到親者的倫理關係，他者並不是毫無干係的外在者。外星人對於我來說，並不是他者。因為人類無需對外星人負有任何責任。正如上述提及的他人的臉、他人之變化或人性是對我賦有道德責任。被復活的親者對於我來說道德要求是什麼？這將是一個頭疼的問題。我不需

要照顧被復活的長者，唯一的責任是我需要記住失去的長者。數字人對於生者的意義在於生者利用數字人遺忘傷痛。我們無法通過移情方式使得記憶歸因於數位人，產生“數位人的記憶”；儘管數字人存在，但是卻無法產生他者的影響力。“我們相信他人的存在，因為我們和他共事，影響他並受他的行動的影響。”(保羅·利科 2018, 164) 因此說，這一點是清晰的。數字人無法成為他者，尤其是倫理意義上的他者。在這一推理之上，我們可以說，並不存在作為數字人的記憶。我們也無法想像這樣一種物件的存在。

數位人能否成為親者？在歸因自我和歸因他者中間存在一個不對稱區域，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無法調和，為了解決這樣的難題，引入一個新的範疇，親者。“親者，是臨近的他者，是有優勢的他者。”(保羅·利科 2018, 168) “親者，這些人對我們很重要，我們對於他們也很重要，其位於自身和他者之間的關係距離變化範圍之內。距離的變化，同樣還有親疏遠近的相互作用的主動和被動方式的變化，使親近成為一個不停保持著運動的動態關係：變得親近了，覺得親近了。”(保羅·利科 2018, 167) “記憶歸因於親者”意味著我們負有必須記住親者的責任。但是在現實生活中親者沒有責任記住數位人，數位人也無法納入到家族記憶的譜系中。

五、數字復活：主體的意義闡述

在一般情況下，數位復活是科幻化敘事的背景設定，我們在很多科幻片中看到類似的設定。在今天數字復活已經成為現實的事情，當背景變為對象時，一切變得都有爭議了。對於數字復活自我、他者和親者的行為來說，其行為實質存在極大區別。復活自我的本質是增強意義上的做法，而復活他者則是懷念意義上的做法；復活親者是悼念意義上的做法。

1. 數字復活自我的意義

正如上面分析指出的，自我復活是一種增強意義上的數字復活。這將借助意識上傳與元宇宙技術才能實現，智慧體可以在元宇宙中實現進化，從而形成數位自我。2020年美國科幻片《上載新生》就採取了意識可以上傳的設定。儘管意識上傳目前還是科幻想象的產物，但是其邏輯基礎意識的資料化已經開始為科學家所擔憂。2021年神經科學家蒲慕明一個擔心是意識與記憶成為數字商品。自我復活的過程中，智慧體可以形成屬於數位自我的記憶，具備“屬我性”。如果數位自我成為可能，這意味著數字人作為他者建立起來，一種新的主體間性問題出現了。復活自我對於生者來說，有著延長生命的強烈願望，甚至想實現永生(immortal)。因此這種技術又將約納斯的問題凸顯了出來。約納斯就曾經在責任原理中談到“逃脫死亡詛咒”是科學給予的一種博愛禮物，但是以往的倫理學是無法處理這一點的。“我的點是‘已經承諾的禮物’提出了從前倫理學根本不會以實踐選擇名義追問的問題，那種把人類恒常視為理所當然東西的從前的倫理學沒有一個原則能夠很好地處理他們。”(Jonas 1984, 19)那麼數位復活是否可以看作一種“逃脫死亡詛咒”的新形式？從理論上看，這種技術的確是逃脫死亡詛咒的新形式，因為主體能夠通過意識上傳而實現再生。

2. 數字復活他者的意義

上文分析指出，死者的數字復活會影響記憶的屬我性。數字人的公共復活往往會破壞屬我性，產生“無主記憶”，使得數位人成為一種傳播的公共資源。被復活的他者(AI智慧體/數位人)能夠記住卻沒有責任記起生者，無法形成特定的“他者的記憶”。歷史人物可以作為復活的他者物件。上文所提到的“情景化構念表徵方法”就可以作為復活歷史人物的技術手段。AI模型在大規模的歷史文本中測量那些已逝去的心靈。這類復活並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復活，只是利用大模型對歷史人物的心理進行測量。

這是出於科學研究的需要，所以對其他人來說，並不存在責任意義上的歸因。

數字復活他者是具有獨特的意義，比如紀念意義上的數字復活。能夠讓英烈、英雄重新復活，可以讓觀者面對面。我們曾經設想過復活歷史上的哲學家，做到與數位哲學家進行對話。但是這種做法並不是紀念意義上的做法，其實質大概是致敬。如果能夠復活英烈、英雄、歷史人物，上述被復活的物件作為他者存在的標準就是能否產生道德責任意識？在致敬的行為中，隱含著一種嚴格的倫理要求：活著的人有責任把英雄的精神傳承下去。很顯然，這一點基本上是可以確保的。數位技術能夠讓英雄人物變得真實，這種倫理義務會進一步強化。

3. 數字復活親者的意義

其中最具記憶意義的當屬數字復活親者的做法了。因為復活者與被復活者之間存在親屬關係，所以這種復活在倫理上有根據，我們可以把這種根據看作“悼念”意義上的做法。在現有的技術水準下，生者利用數位技術、AI 技術使得死者重新在場，“使得他者被記起”，是一種想像投射和回憶構建。這種做法可以實現兩個目的，其一是“通過回憶實現遺忘”，當死者再次出現在生者面前，他會遺忘失去親人的痛苦。《絕密檔案》就是這樣一部影片，主人公提奧·詹姆斯因為女友意外逝世而製造了機器人。可以想像未來數位復活親者的空間很大，甚至可以做到復活祖先。

六、結語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數字復活是一個非常複雜問題，容易引發社會倫理爭議。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數位復活的可能性大大加強。從記憶歸因的角度看，數字人無法形成自我記憶，但是能夠形成他者記憶，尤其是親者記憶。數字人也並不能作為他者存在，無法形成我對於他者的責任。如果用列維納斯的臉來

說，數字人是無臉的存在者，即便我再次看到了親人的臉形。對於親者來說，數字復活能夠給予一種安慰，讓生者的痛苦得以舒緩。古人的無處寄思念在今天變成了數字思念。有可能出現的一種情況是：古人的“死生從此各西東”不再是人生遺憾，而是變為睹“物”思人。

如果我們注意到，數字復活取決於兩個方面的推動，一是人類倫理上的要求，二是技術發展上的驅動，那麼對這個現象的分析發現其中的被隱藏的問題。

從人類倫理上看，增強與記憶會成為背後的潛在要求。千百年來，人類通過各種方法增強自身，借助數位技術、人工智慧實現的數位永生成為追求目標，但是倘若如此，人的時間性本質會被解構，公平公正就會湧現出來。本來生老病死乃是自然規律節奏。秋天到，枯葉落。人類社會也是如此，一代一代傳承下來，構成了生生不息。但是永生則會打破這種節奏，人的時間性、歷史性的基本規定性會受到極大衝擊，人類真正的經驗也不在被持有。此外在與永生人的交往中，如果無法達成共同體道德規範，恐怕共存只是一種說辭。筆者也曾經多次探討人與強人工智慧的共在、共存甚至達成契約關係，而這一切的前提在於共同體道德規範的可能性。

從技術發展看，我們要看看到數位復活絕不僅僅是逝者的數位再現，至少兩個技術會改變這一切。首先是解讀歷史資料的大模型逐步實現著通用人工智慧，從這一點看，相應的大模型會發展成為自主意識的智慧體，而這一類智慧體遭遇關機問題，會怎麼處理反應將是一個難題。其次能進行理解的智慧體。被構建的數位人成為形式上的他者已經成為可能，很多學者也論述了這一點。但是能夠成為責任意義上的他者恐怕是接下來要應對的問題。而從解釋學角度看，語言決定著理解，那麼如果數字人能夠構造出適理解的語言形式，這一切的問題就都會發生變化。還有曾經我們討論過的數字智慧體通過學習習得的某個主體的資料

—經驗和原本的人的經驗有著何種關係等等，都將成為需要分析的問題。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吉爾貝·西蒙棟，許煜譯：《技術物的存在方式》，南京大學出版社，2024，頁234。〔英文原著：Gilbert Simondon.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Translated by John Rogove and Cecile Malaspina. (Minneapolis: Univocal Publishing, 2017).〕
- 伽達默爾，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頁464, 465-70, 491, 581及817。〔英文原著：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2nd revised, translated by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Continuum Intl Pub Group, 1998).〕
- 李飛飛，趙燦譯：《我看見的世界》，中信集團出版社，2024，頁412。〔英文原著：Fei-Fei LI. *The Worlds I See: Curiosity, Exploration, and Discovery at the Dawn of AI* (Flatiron Books: A Moment of Lift Book, 2023).〕
- 保羅·利科，李彥岑、陳穎譯：《記憶，歷史，遺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161, 164, 167 & 168。〔英文原著：Paul Ricoeur.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Translated by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 約翰·塞爾，楊言萊譯：《心、腦與科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頁89, 97及99。John R. Searle. *Minds, Brains and 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胡塞爾，李雲飛譯：《被動綜合分析：1918-1926年講座稿和研究稿》，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15及17。〔英文原著：Edmund Husserl. *Analyses Concerning Passive and Active Synthesis: Lectures on Transcendental Logic*, 2001.〕
- 理查德·A·科恩，俞宣孟譯：〈柯亨他人的臉：作為第一哲學的倫理學——伊曼紐爾·列維納斯思想中兩種類型的哲學〉，《哲學分析》，2014(6):43 & 45。Richard A. Cohen. “The Face of the Other, Ethics as First Philosophy: Two Types of Philosophy in the Thought of Emmanuel Levinas,” translated by Xuanyu Meng, *Philosophical Analysis*, 2014(6):43&45.
- Cassirer, Ernst.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Volume 1 Language, translated by Steve G. Lofts (Routledge, 2021), 85, 91–2 & 342.
- Chen, Yuqi et al. “Surveying the Dead Minds: Historical-Psychological Text Analysis with Contextualized Construct Representation (CCR) for Classical Chinese.” 2024. <https://arxiv.org/html/2403.00509v1>.
- Clark, Kenneth. *The Nude: A Study in Ideal Form*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56), 205.
- Di, Xinhan et al. “Bailing-TTS: Chinese Dialectal Speech Synthesis Towards Human-like Spontaneous Representation.” <https://arxiv.org/pdf/2408.00284>.
- Good, I. J. Speculations Concerning the First Ultraintelligence Machine. *Advances in Computers* 6(1966):38, 45.
- Jonas, H. *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19).

- Mackenzie, Donald. *Egyptian Myth and Legend* (The Gresham Publishing Co. 1913), 16.
- Riva, Giuseppe et al, *Psychomatics -- A Multidisciplinary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rtificial Minds*. 2024.
<https://arxiv.org/abs/2407.16444>
- Thompson, Jon W. *The Metaphysics of Resurrec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Philosophy* (Springer, 2022), 35-6 & 141-80.
- Thornley, Eilliott. "The Shutdown Problem: An AI Engineering Puzzle for Decision Theorists," 2024. <https://arxiv.org/abs/2403.04471>.
- Turchin, Alexey et al. "Classification of Techn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Revival of the Dead.," 2018.
<https://philpapers.org/archive/TURCOA-3.pdf>.
- Willmann, Tim und Amine El Maleq. *Sterben 2.0 (Trans-) Humanistische Perspektiven zwischen Cyberspace, Mind Uploading und Kryonik* (Berlin/Boston: Düsseldorf University Press, 2022), 134.